苏联的孙中山研究(80年代)

(苏)阿·伏洛霍娃 阿·伊帕托娃

徐稚芳译

中国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苏联的伟大朋友孙中山的名字在我国早就为人们所熟知。1897年，还在他革命活动的早期，《俄罗斯财富》杂志就刊出了从英文翻译的小册子《伦敦蒙难记》，标题为“比童话更离奇。中国孙中山博士关于他在伦敦遇难、被俘的笔记。”①这样，在90年前孙中山的名字就到了俄国。从此以后，他的名字未从我们的刊物、首先是学术性刊物上消失。在苏联经常纪念他生平的纪念日、20世纪头25年与他名字紧密联系的、中国革命史的重大纪念日。孙中山的名字永远进入了苏中关系建立和发展的历史。孙中山是属于这样一些历史活动家，人们对他们的兴趣是与日俱增的。

俄国发表关于孙中山的最早文章还是在20世纪初，孙中山在世时。列宁在《真理报》、《涅瓦河之星》上发表的关于中国革命运动的文章——《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②和《复兴的中国》③是众所周知的。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的这些文章是对20世纪初中国社会政治进程和孙中山以及他的革命纲领的历史作用作辩证的分析和评价的典范。列宁既批评了孙中山主观主义的意图，又高度评价他作为中国革命民主主义运动领袖的活动，也高度评价他的在许多方面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的纲领。列宁力求首先从中国的文献中获得关于中国的信息，以便取得关于在中国发生的社会进程的具体内容和特点的看法，首先从历史时期和历史现象的总的特点和规律的角度来考虑。正是这样一种方法——从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客观地评价特殊——决定了列宁的著作及其关于中国革命民主主义发展道路和这一革命的任务与策略的结论的生命力和永久价值。对苏联的汉学家来说，列宁关于中国革命运动及关于孙中山和他的革命纲领的著作永远是研究孙中山的历史作用、研究他的学说的方法论基础。列宁提出的论题永远是苏联孙中山研究者、研究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历史的专家的注意中心。列宁的论题既在一般性的著作中研究，也在一些专题研究中探讨。有十多部著作是写《列宁和孙中山》或《列宁和中国》，其中列宁对孙中山的评价占有重要地位。所有研究孙中山的活动和观点的苏联专家和历史文献的作者都一致认为，列宁关于1911—1913年间的中国的著作奠定了苏联对孙中山研究的基础，这些著作包含了对孙中山的纲领和活动的评价，以及对整个中国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评价。

从60年代起，苏联研究中国历史的汉学家开始越来越经常研究列宁的评价，不断扩大和深化研究的范围，把重点放在列宁分析当时中国现实的方法论方面。这些文章的特点是：更翔实、更全面地研究了列宁关于辛亥革命、关于孙中山著作的写作的历史背景，分析这些著作包含的论点，并和当时列宁发表的其他文章相联系，研究列宁论述中国的著作的史料学和信息的基础，提出关于列宁的评价与自由主义——立宪民主党人的评价以及第二国际多数领

导人对待孙中山及其政党的态度有原则区别的问题，在科学研究中引用1911—1913年间布尔什维克刊物上发表的资料。研究20世纪初中国革命运动史的汉学家尤·马·戈鲁向茨在60年代发表了一组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文献学文章，④⑥他特别提出“东方的历史文献学的列宁阶段”。⑤

苏联汉学家在分析列宁对孙中山和他的革命纲领的时候，都赞同列宁遗著中的正确看法和理解，以及列宁对孙中山的一系列评语中对具体的历史环境所作的估计。

1971年出版了大型的集体专著《列宁主义和东方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其中有两位汉学家达·尼·阿卡托娃和列·彼·杰柳辛合写的文章《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问题》。⑦与戈鲁向茨的文章一样，这是关于列宁对中国革命评价所作的非常重要的研究，这一研究既是以对列宁文章方法论问题的分析，也是以对文献精细的分析为基础。作者并不局限于仅仅研究列宁论中国的文章，也研究了列宁的其他很多著作，如：《斯托雷平和民粹派的土地纲领的比较》⑧、《论俄国各政党》⑨、《两种乌托邦》⑩、《论经济理想主义》⑪。正是这样的研究方法，使他们能更确切地揭示列宁在说明孙中山的“社会主义的”观点时使用过的“反动的”这一定语的含义，作者们在精细地分析列宁的文章《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和《论经济理想主义》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列宁在这里是在历史、哲学的意义上运用这个词，目的在于评价那些为了说明自己的概念而从旧武库借用理想的理论家的错误态度。作这样的解释，“反动的”这一定语就既不涉及理论家本身的个性，也不涉及他们的纲领。⑫苏联其他的汉学家也采取相似的方法来研究列宁论中国的著作。特别是老一代汉学家的代表，格·符·叶菲莫夫教授在他的文章《论列宁对中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评价》⑬中，就是用这种方法。这篇文章收在《弗·依·列宁和亚洲历史问题》(列宁格勒，1970)一书中。列宁对于作为亚洲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杰出代表孙中山的历史作用的评价，无论在研究历史的、或是当时的民族解放和革命运动的进程时，都仍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不仅如此，列宁的评价的学术价值与政治现实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具有更重大的意义。苏联孙中山研究的其他研究方向的产生，实际上也是与列宁的论题紧密联系的。

在两位苏联老一辈的汉学家，莫斯科的符·尼·尼基弗洛夫教授和列宁格勒的格·瓦·叶菲莫夫教授的著作中，对60—70年代苏联孙中山研究情况作出了综述性的、翔实的分析。1978年，符·尼·尼基弗洛夫在《近代和现代历史》杂志第5期发表了《苏联历史文献学对于十月革命以后时期孙中山活动的论述》一文，而在1980年，格·瓦·叶菲莫夫在列宁格勒出版了《中国近代史文献资料历史图书分类概述》一书的第四版，该书许多章节都详细地阐述了有关孙中山课题的文献和资料。

总括苏联汉学家60—70年代的著作，在孙中山课题研究方面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基本方向。

1.孙中山的历史作用和孙中山学说的阶级实质（包括对列宁评价的研究）。

2.孙中山对待人民群众和群众运动的态度。

3.孙中山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和活动。

4.孙中山对苏联的态度及其与苏联友好合作的政策。

5.“防止”资本主义或者“限制”资本的问题和中国未来发展的问题。

6.苏联孙中山研究的历史文献学。

7.对国外研究孙中山活动与理论遗产的文献的批判分析。

8.文件资料的出版工作。

80年代，苏联的汉学家一方面继续前一时期提出的方向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又以新的题目来充实对孙中山的研究。例如：孙中山与传统的乌托邦思想。对孙中山学说及其纲领的各个方面的研究、紧密联系当时国内和国际的思想理论和社会政治形势、对孙中山政治实践的研究，比前一时期更加强化和更加深入了。

80年代苏联的孙中山研究又充实了新的科研成果和出版了一批新书。下面就其中我们认为比较重要的向大家作一介绍。

1980年符·尼·尼基弗洛夫教授的《中国最早的革命民主主义者》⑭一书问世，这本书系统地论述了从1894年到1903年时期的史实，1982年出版了这本书的续集——《亚洲觉醒年代的中国》⑮（1903—1905年）这一专著。在第二本书中，在论述革命运动中的孙中山派和非孙中山派的时候，作者称孙中山为中国革命运动的奠基人和公认的领袖，当时中国社会最进步的观点的表达者，作者公正地指出，孙中山的观点有别于当时革命民主主义其他思想家如邹容、陈天华、章炳麟等人，他的革命民主主义、人道主义、宣传世界大同思想和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原理，比后者的观点更为有益。⑯

1981年出版了格·瓦·叶菲莫夫的专著《孙中山·道路的探索·1914—1922》⑰，这本书是在作者身后发表的，（由符·尼·尼基弗洛夫教授续写完并编辑），格·符·叶菲莫夫还在30年代就开始了《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专题研究，多年的研究工作以这部书的出版而告完成。在他的最后一部书中，作者论述了孙中山生平和活动中研究得最少的阶段，认为这一阶段是孙中山探索新的革命道路、探索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新态度的时期。七章中有两章是写孙中山在上海时期的生活与活动，这是他撰写理论巨著——《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的时期。格·符·叶菲莫夫分析了《建国大纲》、《建国方略》和孙中山在1917—1919年间对中国未来建设的全部观点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孙中山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反映了他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极大兴趣，及其在自己的理论著述中运用普遍受欢迎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愿望，同时也反映了“中国的思想家和革命领袖为建立一个摆脱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和弊病的制度的始终不渝的志向”⑱。格·符·叶菲莫夫高度评价作为中国革命领袖的孙中山，认为孙中山的“不可剥夺的高尚品格在于他总是走在时间的前面，以他的思想超越了自己的同时代人”。⑲

80年代研究孙中山问题的还有苏联经济学家兼汉学家格·德·苏哈尔楚克博士。1983年苏哈尔楚克发表了专著《20世纪上半期中国政治领袖的社会经济观点》，⑳其中有一章专门是研究孙中山的。作者从孙中山致李鸿章备忘录开始力图分析孙中山社会经济观点的演变。同时，苏哈尔楚克对孙中山的立场和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的其他领导人（蒋介石等）的纲领性方针和观点作了比较分析。

苏联汉学界的一件著名大事是1985年出版了历史学博士莉·尼·鲍罗赫有重大价值的专著《中国的社会思想和社会主义（20世纪初）》。㉑莉·尼·鲍罗赫早就严肃地从事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思想的研究，在她的研究中，孙中山理所当然地占有中心地位。1971年她发表了专著《兴中会》㉒。新发表的专著的一章是研究民生主义，题目是《民生主义——孙中山的社会主义》。鲍罗赫叙述了把“民生主义”列入《同盟会》纲领的历史、孙中山和这一组织其他领导人对这一主义的解释，指出其中传统的和西方的思想的相互关系，最后她得出结论：早在20世纪初孙中山和他的追随者在关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讨论中已经否定了西方的发展道路，认为那条路是走不通的失败之路。鲍罗赫“在与垄断资本的发展有联系

的、经济和社会的变化中”㉓看到了孙中山否定西方道路的主要原因。

鲍罗赫称孙中山的社会经济纲领为“主观社会主义的”，她认为在评价这一纲领时必须考虑其特点：力求避开资本主义阶段，提出“落后优越论”、重视伦理的因素、注意传统的社会文化遗产㉔。鲍罗赫以苏联文献中所采取的方法论为依据，建议从两个立场研究孙中山的纲领：1.按照列宁的文章《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1912年），把这一纲领看作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加上”社会主义性质的一种形式；2.从列宁提出的关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东方各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出发，在孙中山的纲领中看到新型的思想意识开始形成。对资本主义不妥协的批判、要求避开资本主义的愿望、阐述建立平等社会的必要性的企图，使鲍罗赫有根据说孙中山的纲领是超出资产阶级框框的一种发展战略，即另一种社会主义，只有联系中国传统的乌托邦思想的发展（与世界大同的学说相比，这一发展是个新阶段），才能理解这种特殊形式的社会主义。㉕

在娜·列·马马耶娃发表在《远东问题》1986年第1期上的文章《论孙中山的政治纲领问题》㉖中研究了孙中山政治纲领的某些观点。作者根据孙中山本人的论述，仔细分析了他的著作和国民党的文件，明确了战争时期国家建设的任务、要求和口号（这些任务、要求和口号就是在国民党政权下全国的团结、对军队、行政机构和财政体系进行改组和中央集权），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孙中山政治纲领的“全民族性质”。文章作者成功地阐述了孙中山在其生活后期政治纲领中出现的一些新因素。作者首先注意孙中山重视群众运动问题，重视在建国大纲下奠定群众基础的问题。跟以往一样，在所有关于中国近代和现代史的著作中都论及孙中山课题，其中包括1983年出版的集体写作的专著《中国现代史，1917—1927年》㉗孙中山作为南方革命政府领袖、国民党的领导人、全国范围革命运动的公认领袖、建立和发展苏中友好关系的始终不渝的积极倡导者，在这些著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孙中山课题实际上是所有论述19世纪末20世纪头25年中国革命运动史、社会思想史和俄中两国革命联系的著作中的主要问题之一。1982年在《历史问题》杂志第10期发表了奥勒尔市叶·依·恰普凯维奇的文章《辛亥革命前夜和辛亥革命时期俄中的革命联系》㉘，他的专著《布尔什维克和20世纪初亚洲资产阶级革命》㉙在1985年问世。恰普凯维奇成功地发现了辛亥革命年代（1911—1913）在布尔什维克报刊上发表的42篇文章。其中除了列宁的著名论文之外，还有塞·米·基洛夫在《捷列克》报（高加索）上发表的文章、阿·塞·布勒诺夫、米·拉·米哈依洛夫、米·斯·奥尔明斯基以及俄国革命运动其他著名的活动家的文章。恰普凯维奇令人信服地指出，当时布尔什维克报刊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评价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报刊的评价有原则的区别，同样，与第二国际领导人的立场也有原则区别，后者认为没有必要支持辛亥革命，其理由是辛亥革命与国际工人运动似乎没有任何共同点，而它的领袖孙中山仿佛是一个“幻想家和无能的人”。㉚叶·依·恰普凯维奇根据档案资料，论据充分地表明，还在辛亥革命之前，布尔什维克和中国革命者之间已经有了联系。特别是他描述了孙中山如何派自己的战友宋德去哈尔滨，要宋德在那里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地方组织进行接触。㉛

1985年列·彼·杰柳辛和阿·塞·柯斯佳耶娃发表了他们合写的专著《中国1925—1927年间的革命：问题与评价》㉜。这本书是将问题和结构上都是有机联系的历史研究和历史编纂学研究加以独特综合的极为成功的尝试。书中对孙中山晚期活动作了相当详尽的描述，强调指出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同情态度。在这一时期孙中山的革命民主主义纲领充实了新的

内容，新内容使他的纲领具有了更鲜明的反帝性质。

在许多研究中国革命运动各种问题的专题论文中也涉及到孙中山和中国革命，这是非常自然的，例如：年青的汉学家叶·尤·斯达布洛娃的《中国的无政府主义》㉝，阿·谢苗诺夫的《廖仲凯》㉞、阿·安·皮萨列夫的《国民党的土地纲领》㉟等。

苏联80年代孙中山研究的重大事件是《孙中山选集》㊱修订和补充第二版在他逝世六十周年时问世。1985年在苏联举行了一系列活动纪念这位伟大的中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再版《孙中山选集》是其活动之一。1964年《孙中山选集》第一版问世至今已过了20多年，这本书早已成为珍本。新的版本补充了孙中山“三民主义”演讲的俄语译文、孙中山的一些文件和答记者问等。第二版的责任编辑塞·列·齐赫文斯基（他也是第一版的责任编辑）在前言中指出，《孙中山选集》的新版本“将使苏联广大读者有可能全面了解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和他的社会政治和哲学的观点。”㊲同年（1985），在《历史问题》杂志第11期上塞·列·齐赫文斯基发表历史文献学文章，他对当代国外孙中山研究的文献作了批判性的分析。㊳1986年，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之际，他在《远东问题》第3期，在《人民事业的战士》专栏里发表了《孙中山——伟大的中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苏联的朋友》㊴一文。文章作者认为孙中山的历史贡献在于“他公开地举起了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旗帜，他是亚洲第一位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组织民众一致对敌的国家领导人”。㊵齐赫文斯基在极为概括性的论文中令人信服地指出，孙中山的历史作用，他对中国革命的意义远远超出他积极的革命活动的历史界限。他在文章结束语中写道：“由于中国革命的敌人相当强大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在资产阶级领导下不可能胜利地彻底完成。”这一任务只有在1949年10月人民革命胜利之后才能实现。齐赫文斯基得出的结论是：“为了中国革命战胜内外反动势力光荣地取得彻底胜利，中国人民的卓越儿子孙中山以40年的革命活动作出了令人永誌不忘的贡献。”㊶

1986苏联广泛而隆重地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成立了组织委员会，这一委员会的主席是塞·列·齐赫文斯基院士，他是苏联第一流的历史学家、著名的孙中山活动和观点的研究者。组织委员会的成员中有许多著名的苏联东方学研究者、历史学家。纪念活动的重大措施是举行科学讨论会，讨论会于1986年10月13—14日在莫斯科举行。塞·列·齐赫文斯基作了题为《孙中山——伟大的中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苏联的朋友》的报告。中国历史学家参加了讨论会的工作，中国孙中山研究会副主席刘大年在会上作了报告。

1986年11月初，孙中山诞辰120周年之际，苏联出版了塞·列·齐赫文斯基的专著《中国革命家的遗言》。㊷这本书是他在20年前发表的专著《孙中山.外交观点和实践》㊸一书的修订和增补版。他的书和《孙中山文集》一样，虽然已成为珍本，但仍不失其学术价值和政治现实意义。齐赫文斯基专著的主要题目是孙中山的反帝思想，孙中山在反帝斗争中对目标、任务和策略的观点的演变。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在书中是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展现的，包括国际的和中国国内的历史背景。正是这样一种写法，使作者能揭示出孙中山的反帝思想与他争取中国的进步发展的斗争之间的紧密的相互联系。

书中引用的大量实际资料使作者能够观察到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孙中山观点和活动变化的影响，揭示出中国民族解放和革命运动中新倾向的产生和发展，表现出孙中山和苏维埃国家代表直接接触以及孙中山很想了解苏维埃国家建设新社会的经验的意义。书中令人信服地指出，这些变化首先表现在孙中山放弃与个别军阀联盟的策略，拒绝向帝国主义国家

寻求支持，在晚年，他越来越倾向于与苏联友好合作。1924年11月23日，孙中山在辞世前不久答《长崎报》记者问时声称："中国革命的目标和俄国革命的目标是一致的，中国和俄国革命走的是一条路。因此，中国和俄国不仅关系密切，而且按其革命联系来说真正是一家人。"㊹

成为本书的有机组成部分的新的一章是《从苏中友谊的敌人的歪曲看孙中山对待苏联的态度》。齐赫文斯基在这一章里概括和发展了他早年的学术方向之一——批判资产阶级的孙中山研究，他提出并批判地分析了70年代和80年代初出现的新倾向，批判分析的中心是三个西方汉学家：克·马·乌依布尔（美国）、特·克·肯德尔曼（联邦德国）和特·石富林（以色列）的著作。

正式文件的公开出版物、曾在孙中山政府工作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回忆录（阿·依·车列潘诺夫等），㊺以及与孙中山见过面或共过事的苏联人的回忆录，为研究作为中国革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和中国南方革命政府的领导人的孙中山与苏联之间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实际的文献资料。60—70年代发表的许多回忆录，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版了修订增补的再版本。其中有塞·阿·达林的《中国回忆·1921—1927.》，㊻达林作为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曾于1922年在中国南方工作，并会见过孙中山。1982年这本书经过补充又出版了。档案文件和资料《布留赫尔在中国》㊼的单行本也发行了两版，其中包括负责编辑此书的安·依·卡尔东诺娃写的大篇文献概略。论述孙中山与苏联这一课题的还有齐赫文斯基一本小册子《孙中山——苏联的朋友》。㊽这个题目，在1986年10月13—14日在莫斯科为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举行的科学讨论会上，许多报告和发言中都谈到了。1986年，为纪念孙中山，苏联的汉学家汇编了一本文集《孙中山·1866—1986·诞辰120周年》。㊾文集中收集了曾和孙中山共事或认识孙中山的苏联人的文章和回忆，也有孙中山写的文件和资料，或者是他作为中国南方革命政府领袖签署的文件。这本文集不久即将问世。

为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苏联还有中文和英文出版了塞·列·齐赫文斯基的通俗小册子《孙中山——伟大的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家》。㊿在纪念日，中央和地方报刊发表了纪念孙中山的文章。

本文作者没有为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即阐述或者列举80年代上半期在苏联发表的所有论述孙中山的著作。这方面的文章比上述多得多。但就是一简短的概述，也可以证明苏联对孙中山个人的自始至终永不改变的重大兴趣，和苏联汉学家对孙中山为争取中国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所作的斗争的历史以及他的理论遗产，进行严素认真研究的情况。

对孙中山的活动和观点的进一步研究，可以成为苏中两国学者进行科学合作的卓有成效的领域，这种合作将促进对中国在20世纪头25年里与伟大的孙中山的名字紧密联系的民族解放和革命斗争史的更深入、更全面的研究。它也必将对我们两国之间睦邻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发挥积极的作用。

---

①《伦敦蒙难记》、《比童话更离奇，中国孙中山博士关于他在伦敦遇难、被俘的笔记》。《俄罗斯财富》，1897，第1期。

②列宁·弗·依·《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全集，第21卷，第400—406页。

③列宁·弗·依·《复兴的中国》，全集，第22卷，第189—191页。

④戈鲁向茨·尤·米·《苏联关于中国辛亥革命的历史文献》，《亚非人民》，莫斯科，1962.第2期。

⑤戈鲁向茨·尤·米·《东方的历史文献学的列宁阶段》，《亚非人民》，莫斯科，1965.第5期。

⑥戈鲁向茨·尤·米·《列宁论中国辛亥革命中人民群众的作用》，《亚非人民》，莫斯科，1966。

⑦阿卡托娃·达·尼·《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问题》，见《列宁和东方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一书，莫斯科，1971。
⑧列宁·弗·依·《斯托雷平和民粹派的土地纲领的比较》，全集，第21卷，第380—386页。
⑨列宁·弗·依·《论俄国各政党》，全集，第21卷，第257—287页。
⑩列宁·弗·依·《两种乌托邦》，全集，第22卷，第117—121页。
⑪列宁·弗·依·《论经济理想主义》全集。
⑫阿卡托娃·达·尼·杰柳辛　《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问题》，第135页。
⑬叶菲莫夫·格·瓦《论列宁对中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评价》，见《弗·依·列宁和亚洲历史问题》一书，列宁格勒，1970。
⑭尼基弗洛夫·符·尼《中国最早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莫斯科，1980。
⑮尼基弗洛夫·符·尼《亚洲觉醒年代的中国》，莫斯科，1982。
⑯同上，第211，219，231，233页。
⑰叶菲莫夫·格瓦《孙中山·道路的探索·1914—1922年》。莫斯科，1981。
⑱同上，第146页。
⑲同上，第147页。
⑳苏哈尔楚克·格·德·《20世纪上半期中国政治领袖的社会经济观点》，莫斯科，1983。
㉑鲍罗赫·莉·尼·《中国的社会思想和社会主义（20世纪初）》，莫斯科，1984。
㉒鲍罗赫·莉·尼·《兴中会》莫斯科，1971。
㉓鲍罗赫·莉·尼《中国的社会思想和社会主义》，第201页。
㉔同上，第202页。
㉕同上，第203页。
㉖马马耶娃·娜·列《论孙中山的政治纲领问题》，《远东问题》，莫斯科，1986.第1期
㉗《中国现代史，1917—1927年》，莫斯科，1983。
㉘恰普凯维奇·叶·依·《辛亥革命前夜和辛亥革命时期俄中的革命联系》，《历史问题》，莫斯科，1982.第10期。
㉙恰普凯维奇·叶·依·《布尔什维克和20世纪初亚洲资产阶级革命》，莫斯科，1955。
㉚同上，第133页。
㉛同上，第121页。
㉜杰柳辛·列·彼·柯斯佳耶娃·阿·塞·《中国1925—1927年间的革命：问题与评价》，莫斯科，1985。
㉝斯达布洛娃·叶·尤《中国的无政府主义》。
㉞谢苗诺夫·阿·《廖仲凯》。
㊱皮萨列夫·阿·安·《国民党的土地纲领》。
㉟《孙中山选集》，莫斯科，1985。
㊲同上，第6页。
㊳齐赫文斯基·塞·列·《历史问题》，1985.第11期。
㊴齐赫文斯基·塞·列·《孙中山——伟大的中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苏联的朋友》，《远东问题》1986年第3期。
㊵同上，第106页。
㊶同上，第124页。
㊷齐赫文斯基·塞·列《中国革命家的遗言》，莫斯科，1986。
㊹齐赫文斯基·塞·列《孙中山·外交观点和实践》，莫斯科，1964。
㊸《孙中山选集》，第717页。
㊺车列潘诺夫·阿·依《在中国的苏联军事顾问的笔记》。